

也谈钟嵘《诗品》对陶渊明的评价

张文东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 历代诗论家对《诗品》所评诗人的品第问题多有微词, 然《诗品》对所评诗人的品第安排问题与那个时代的文学观、钟嵘自己的文学观以及后来《诗品》和陶渊明分别被接受的情况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萧统对陶公文学成就的评价与《诗品》实为渊源关系。

关键词: 钟嵘;《诗品》;陶渊明;萧统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5261(2014)04-0082-03

钟嵘《诗品》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为后人所重视, 然而历代诗论家对《诗品》所评诗人的品第问题多有微词, 如所谓“品陶不公, 第谢不允”的指责。《诗品》中被历代评论家所非议者, 大约有魏武帝、魏文帝、宋征士陶潜、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梁左光禄沈约等几条, 其中最甚莫过于陶潜条。《诗品》对所评诗人的品第安排问题与那个时代的文学观、钟嵘的文学观以及后来《诗品》和陶渊明分别被接受的情况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故于此略申拙见。

《诗品》因其“致流别”之体例, 所面临的第一个责难就是陶诗的渊源问题: “其源出于应璩, 又协左思风力”。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 “(钟嵘)论陶渊明, 乃以为出于应璩, 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 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 所谓‘下流不可处, 君子慎厥初’者, 与陶诗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 ‘曹爽用事, 多违法度, 璩作此诗以刺在位, 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 超然物外为意, 顾区区在位者, 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 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 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 何期此老之浅? 盖嵘之陋也。”^{[1]86}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六亦云然。《江西诗派宗派图录》山谷云: “渊明于诗直寄焉耳, 绛云在霄, 舒卷自如, 宁复有派? 夫无派, 即渊明之派也。钟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 又协左思风力, 果何所见而云然耶?”^{[2]264}清人沈德潜对此亦有类似语。日本近藤元粹评《诗品》: “陶诗实得诗人温厚之旨, 为千古一人, 应璩、左思辈安得比拟哉。”^[3]这些诗论家由于对陶渊明的推崇, 表达出对钟嵘这一推源

溯流的不满, 仿佛应璩使陶诗大打折扣, 而实际情况如何呢? 应璩的五言诗以《百一诗》流传后世, 诗讥切时事, 讽规之意正与陶诗同, 所谓“语时事则指而可想”也。且陶诗风格上亦与钟嵘所评应璩“善为古语”“雅意深笃”相类。《诗品》推源溯流之体例源于其所谓“《七略》裁士”, 正如张伯伟所说: “钟嵘运用推源溯流法评论诗人时, 其评语至少有两部分组成, 即渊源论——追溯诗人风格的渊源所自; 本文论——考察诗人及作品的特色。”^{[4]291}胡大雷更进一步指出: 钟嵘“渊源论”是或有或无的, 且追溯诗人风格的渊源所自, 并不追溯至最源头而只考察其最近^{[5]16}。也就是说, 钟嵘溯源只是其体例的一部分, 且所溯之源, 取距离所评作者时代最近者, 而不是将最上源也说出来, 其说陶诗源于应璩, 只是因为应璩诗中有与陶的共通处, 且与陶诗有共通处之诗人以应璩距陶渊明时代最近, 并不一定陶诗于应璩以上之诗人没有相承处。这样来看, 叶梦得等人怕因应璩而抑制陶渊明进而对钟氏进行责难就显得没有必要了。他们只关注到“其源出于应璩”, 而忽略了“又协左思风力”之说, 即钟氏认为陶诗中另有一番刚劲之气则非应璩所备, 所以紧接一句“又协左思风力”, 以左思之风力评价陶诗可谓恰合。

诗人风格本身就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钟嵘以“其源出于应璩, 又协左思风力”评价陶渊明, 正是切合实际的表现, 所以后人也有为钟氏鸣不平的, 如王夫之评陶渊明《拟古·迢迢百尺楼》时说: “此真《百一》诗中杰作, 钟嵘一品, 千秋定论耳。”^①游国恩以为左思“胸次高旷, 笔力雄迈, 与陶之音节苍凉激越, 辞

收稿日期: 2013-11-11

作者简介: 张文东(1989—), 男, 河南商丘人, 硕士研究生。

句挥洒自如者，同其风力。”^②许文雨支持此观点，曰“此论甚是”。逯钦立亦同意此说，并说：“钟嵘之论，甚足玩味，未可慢然视之也。”王叔岷《疏证》在分析钟嵘所论之后言：“后人非议钟氏之评陶诗，但就‘其源出于应璩’一语为说，而忽其所谓‘又协左思风力’一层，此非钟氏不知陶公，盖由后人不解钟氏耳。”王运熙更是从应璩诗与陶诗具体内容入手，分析其风格体貌之相似，指出陶诗受应璩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左思是第二位的^[6]。此论在应璩诗不多见的今天看来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然思钟嵘当时，恐怕亦确如王先生所言以两人诗之具体内容作评，只是由于时代久远，作品流失，我们无缘得见而已。由此可见，钟嵘对陶诗的溯源论还是比较中肯的。

溯源之后，钟嵘对陶诗风格特点的评语部分，有意见者几无。至于最后钟氏评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胡仔、黄文煊以为“隐逸之宗”不足以尽渊明而叹钟嵘之陋，然考钟嵘之意，并未以隐逸之宗尽渊明，二人之批判又从何说起？这一点，王夫之、陈衍、古直等均同意钟嵘的看法^[3]。再者，当时陶诗多被认为是“田家语”，而钟嵘质疑此说，以为“田家语”不足以尽渊明，故曰“岂直为田家语？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见，正是钟嵘扩大了陶诗的内涵。诚如朱东润所说：“彭泽之诗，仲伟称为‘隐逸诗人之宗’，推许至此，殆难复过。”^[7]此正是钟嵘对陶渊明推许之词，而胡仔辈以此贬低钟嵘，吾不知其于陶公，果扬耶？果抑耶？鉴于现在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的观点已为学界接受，兹不再论。

关于钟嵘将陶渊明放在《诗品》三品之中品的问题，明闵文振《兰庄诗话》说：“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辈，顾右于潜耶？论者称嵘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标扬极界，以示法程，自唐以上莫及也。吾独惑于处陶焉。”王士禛《渔洋诗话》曰：“陶潜宜在上品。”沈德潜《说诗碎语》云：“陶公……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钟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陈延杰同意王士禛的“陶潜宜在上品”说，并在《诗品注》中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来证明陶诗在《诗品》中原属上品，后来讹误而居中品。冯开《论诗示天婴》亦言：“不解品诗钟记室，却将潘陆压陶潜。”

窃以为诸公以此责难钟嵘“陋言”，质疑钟嵘眼光之浅，是极不公允的。考察钟嵘那个时代，辞采之于“诗”“文”的重要性已为文人所深知。前代曹丕《典论·论文》即已提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也说“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说“伫采

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萧子显在其诗赋集《鸿序》自序中说：“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可知当时诗坛，对辞藻的追求已是社会风气，甚至是一种求取名声的手段，因而令世人趋之若鹜。但就此而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尚，以其“时下所尚”讥前人之不合于己者，后人亦讥其偏狭！即使在陶渊明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唐代，以“诗圣”杜甫的眼光，尚言“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③，勿论其他。放开这一点不讲，钟嵘的眼光不仅高明，魄力也非一般人所比。上文已论，世风尚辞藻，求华艳，而钟嵘却没有囿于当时的文坛风气，而是跳出来审视诗歌，既肯定了时人之辞采，又力挽传统之“风力”，且将“风力”置于首要地位。钟嵘《诗品》正是针对“淄澠并泛，朱紫相夺”的现实状况而作，意在力矫时弊——“建安风力尽矣”“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云云。考陶渊明当时诗名甚微，其所以名重于世者，以“隐士”显。颜延之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是陶渊明生前好友，然其在《陶徵士诔》中对陶渊明文学上的评价仅“学非称师，文取旨达”一句，由此可知当时陶诗为时人所不屑。沈约《宋书》为陶渊明立传，也仅取其“隐士”身份而对其作品无一字涉及，刘勰《文心雕龙》对其只字未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列举了当时颜、谢、休、鲍诸家，也无一字提到陶渊明，连深喜陶渊明的阳休之说到陶潜之文时也叹“辞采未优”^④。这足以说明，陶渊明在当时未被文坛认可，因而在当时诗坛，其影响远无法与颜、谢等人相比。钟嵘的文学观念如其在序中所言：“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青，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至也。”在实际的品评中，他也是这样做的，被其推为第一的曹植正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8][37]}，“骨气”“风力”与“辞采”“英华”都是钟嵘所重视的，而前者在钟嵘文学观里是排第一位的，这既是其文学观念所固然，又是针对当时过分追求华靡风气的一种矫正。对时人都不以为意的陶诗，钟嵘独具慧眼，不仅使陶潜“预此宗流”，进入以后文学讨论的范围，且置于评价不可谓不高的中品，此已是惊世之举^⑤。一定意义上讲，陶渊明因其诗之古朴真笃颇具风力而成为钟嵘矫正时弊，提倡更重视风力、骨气之诗学的一个有力工具。易言之，正是由于钟嵘眼光之锐，才使得《诗品》因品陶而高，陶诗因《诗品》而显，实现了双赢。

今察后人多推崇萧统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盖世

之功，其实萧统受钟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诗品》成书在萧统编《文选》及辑《陶渊明集》并为之作序之前，学界已无疑议。试比较两者对陶渊明作品的评价，钟嵘《诗品》：“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萧统《陶渊明集序》：“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由于钟嵘论的是五言诗，故只就诗说；而萧统除诗文外，更侧重强调陶的人格，除此之外，萧统对陶诗的评价与钟嵘几乎全同，如“省净”与“精拔”，“笃意真古”与“旷而且真”，文与德之互见，等等。钟嵘提到陶诗“质直”的同时，还注意到其“风华清靡”的特点，且举了两个例句，而萧统《文选》所选陶诗不多，钟嵘提到的却都入选，顾农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按渊明的《读山海经》和《拟古》均是组诗，萧统各选其一首，都恰恰是钟嵘予以好评者，可知并非巧合。”且《诗品序》未提到的“陶公《咏贫》之制”萧统亦选。这些足以说明，萧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钟嵘《诗品》的影响。所以说，真正第一个把陶渊明的文学地位予以极大提高的，正是钟嵘而非萧统，萧统只是在崇拜陶渊明人格的同时发现了其文章之不群和其诗的“风教”作用。

综上所述，钟嵘于周围人都漠视陶诗艺术的时候，其《诗品》列陶诗于中品，非但无贬义，反而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筚路蓝缕之功。除提高陶渊明诗歌的地位外，钟嵘还准确指出了陶诗“省净”“笃意真古”的特点，认为时人所叹陶诗“质直”“田家语”不足以尽渊明，从而又补充陶诗“风华清靡”的一面，扩大了陶诗的内涵，且准确定位陶为“隐逸诗人之宗”的地位，其眼力与胸次不可谓不高矣。至于后人评陶诗时，进一步揭示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自是钟嵘所未述，然亦不可越代而强求之于一人也。

另外，后人对钟嵘《诗品》中置陶渊明中品的指责与《诗品》的接受也有一定关系。郭绍虞云：“按是书（《诗品》）晦于宋以前而显于明以后，故唐宋类书除《吟窗杂录》节引数语外，余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均未见称引。”^[17]然而萧统《文选》的接受则在唐代已为繁盛，此由李白三拟《文选》的故事和杜甫“熟精

《文选》理”之诗句可知。宋代更是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谣。陶渊明在唐代已被广泛接受，在宋代，由于其人其诗合乎宋人气质，更是被推崇至极，而“品陶不公”的批评几乎全来自宋代以后学者，所知最早的两宋之交的叶梦得，其他诸人以南宋和明代居多。这又是文学接受学的一个现象，陶渊明的形象在唐宋两代被重新建构，而后人这些想象力建构，或许已远离了真实的陶渊明，或许更接近了真实的陶渊明，然无论如何，陶渊明的形象被建立起来了，其诗歌的价值被充分认识了。这种建构，给以后的接受者以直接的知识灌输，即自接触陶渊明始就接受最新最近之评价，而当时最新最近之评价又是最高之评价。加之《文选》的普及程度及宋代对陶渊明的推崇，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当是先接受了萧统的观点，或者先继承了唐宋人对陶渊明之酷爱的接受，心中先有一个其文其德都是“六朝第一流人物”的陶渊明形象，然后在《诗品》中发现陶渊明竟意外地不在上品，故有上述责难，恐此亦有之。

注释：

- ① 转引自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9 页。
- ② 凡引他人对《诗品》评价未注明出处者，均转引自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 ③ 杜甫《遣兴五首》第三首“陶潜”条，见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4 页。
- ④ 阳休之《陶集序录》中语。
- ⑤ 考《诗品》序中称“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知钟嵘此作当与友僚有所商榷。另“晋处士郭泰机”条末句云：“越居中品，金日宜哉。”“金日”意谓“大家都说”，由此二字可知钟嵘品第诗人时参考了周围人的意见，而当时陶诗之不为人重，嵘独拔之，更可见其胸次。

参考文献：

- [1] 许文雨. 钟嵘诗品讲疏[M]. 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
- [2] 曹旭. 诗品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3] 袁媛. 钟嵘《诗品》陶诗居中品辨析[J]. 许昌学院学报，2011(6).
- [4] 张伯伟. 钟嵘诗品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5] 胡大雷. 《诗品》“推源溯流”与文学“新变”[J]. 铜仁学院学报，2011(1).
- [6] 王运熙. 钟嵘《诗品》陶诗源于应璩解[J]. 文学评论，1980(5).
- [7] 曹旭. 《诗品》评陶诗发微[J]. 复旦学报，1988(5).
- [8] 周振甫. 诗品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责任编辑 杨宁]